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12）

戏曲改革发展史

下 册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 编

任葆琦◎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12)

戏剧改革发展史

下 册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 编
任葆琦 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戏剧改革发展史/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 --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6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

ISBN 978 - 7 - 5073 - 4484 - 4

I. ①戏… II. ①中… III. ①中国戏剧 - 戏剧改革 - 戏剧史 - 1937 - 1947

IV. ①J809. 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17443 号

戏剧改革发展史

编 者: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

主 编: 任葆琦

责任编辑: 吴少京

装帧设计: 甘传泉

出 版: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直门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 100017

网 址: www.zywxpress.com

发 行: 中央文献出版社

销售热线: 010 - 63097018 66183303

电子邮箱: zywx5073@126.com

排版印刷: 北京长宁印刷有限公司

787mm × 1092mm 16 开 印张 55.25 693 千字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73 - 4484 - 4 定价: (上下册) 166 元

本书如存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第六章 中国气派的话剧

党中央来到延安之前，延安是没有专业话剧团体的，也没有专业话剧团来此演出过。延安的舞台上出现话剧演出，是党中央来到延安之后。

中国的话剧艺术是从外国引进来的

作为现代的完整的话剧形式，应该说是 1907 年开始从外国介绍进来的。从那时起，舞台上开始用幕、用布景，戏的编排也按三幕、四幕或六幕，也有了独幕剧。至今，它的历史刚过一百年。

1907 年 6 月，有一班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戏剧团体——春柳社，他们采用了欧洲话剧的形式，运用它来反映当时高涨的民族自强思想。

话剧便在中国各地流行起来了，辛亥革命后十年中极为繁盛。当时不叫“话剧”，而是叫新歌，也称为“文明新戏”，一时成为中国剧坛上的璀璨新星。

1928 年 4 月，上海戏剧界同仁的一次聚会上，洪深提议把英文 DRAMA 译为“话剧”，使其区别于中国传统戏曲，也区别于“爱美的”戏剧。提议得到在座的欧阳予倩田汉等戏剧家们的赞同。这个以外部形体动作和对话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艺术形式，从此，终于确立了自己的中国名姓。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话剧活动是在部队中开始的

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起义，中华大地诞生了一支新型的军队。这支部队为了活跃部队生活，开展了文艺活动，并新编演出

了一个小话剧《老祖母念金刚经》，在部队撤离南昌、远征广东途中，为官兵演出。可谓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人民军队，排演了第一个有故事情节、有人物形象的戏剧作品，它宣布了：随着人民军队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的话剧活动，就跟着开展起来了。

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部队诞生后，在哪里落脚，以哪里为家？必须创建革命根据地。为建革命根据地，不仅要打仗消灭敌人求得安宁，还要打土豪筹经费，安排生活；还要做群众工作，宣传革命道理。如何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呢？宣传队便出现了。1928年4月，朱德率队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红四军的宣传队正式纳入部队编制。

宣传队由呼口号、写标语、口头宣传，发展到敲锣打鼓化装宣传。为使宣传内容形象、生动、直观，又采用了化装表演，出现了中国式的活报剧。随着实践的深入，从没有剧本采用典型事例编写、创作出情节简单的剧本，有的还配上民间小调或革命歌曲，有的也利用当地采茶戏、花鼓戏的形式来表现，并从村头墟场的宣传逐步发展到在舞台上公开演出。

建军初期演出的话剧有佚名的《打土豪》，两场话剧。情节是土豪劣绅，在家吃喝玩乐，作威作福，大斗收租，逼得农民家破人亡，卖儿卖女，无路可走。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农会，与地主进行斗争，让土豪们低头认罪。该剧是由活报剧向话剧过渡的一个好作品。

陈子才写的独幕话剧《收谷》，是比较正规的现代话剧的艺术形式了。剧情是，年关将到，贫农老两口，因年景不好，正准备外出躲债，逼债的地主带着人来了，在农民家里搜出他们留着活命粮食，全部拿走了。1928年元宵首演。

《年关斗争》，四幕话剧，作于1929年。方志敏主持创作并参与演出，同年冬在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首演。

方志敏是我党早期领导人，他 1922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江西领导农民运动。1927 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领导弋阳、横峰起义，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政权，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第十军。他为了教育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把戏剧作为进行革命斗争的武器来使用，亲自先后编写了几部戏剧，可惜只留下了《年关斗争》这部剧作。

《年关斗争》这部戏不仅有较完整的戏剧结构和人物形象，而且是从正面描写和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剧作，可以说是“红色戏剧”的代表性作品。该剧作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是由于当年被敌人作为战利品搜罗了去，又流散到国外，新中国成立后由江西的同志从国外寻找回来的。让人欣慰的是，在纪念中国话剧百年时，被选入《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的首卷，成为我国珍贵的话剧史料。

该剧分为四幕三个场景：

第一幕，在地主杨克明家中，杨克明与俞麻子、夏波澄三个土豪饮酒作乐，商量着在年底将各自的租子收上来。同时他们也已得知，共产党正在发动群众进行抗租抗债运动，故很担心在共产党的宣传教育下，他们的租子可能收不上来，商量着如何对付当前的局面。

夏波澄 老兄，你不是说过那班穷家伙穷得卵打鼓吗？还有什么收头吗？他们床把子破被破帐，给我做尿布我还嫌臭了一点。

俞麻子 你不能那么说，克明先生讲得有道理，我们要想在贵溪过得快活，就得多带一些钱，被窝帐子你说破，我倒不嫌它破，只要是东西，收得来总值两个钱，到手就是财。

杨克明 没有钱，没有东西，他们过年的肉我都要给他带来，他们不给，我就到贵溪搬兵来，打得他们屁滚尿流就作算。

夏波澄 好吧！既然你们这么说，我也就在家过了年去，收不到债，丫环婢女都要收一个来。

杨克明 对，收债去；手段要辣一点！

俞麻子

第二幕，在贫苦农民张三的家中。张三的妻在家中正等着去卖柴的张三，和出去砍柴的女儿回来，地主杨克明带着人来收租，见家中只有张三妻一人，便起歹意，强力将张三妻拖进屋里强奸，张三妻不堪受其凌辱上吊自杀。张三卖柴后买了半斤肉回来，正巧碰上杨克明出门。杨克明还让随从抢走了张三的半斤肉，走了。

张三进屋见妻子已经吊死，便明白了是杨克明干的坏事，正要出门去报仇，正遇上土豪俞麻子来收田租，此时，土豪夏波澄追着佃户李四也来了，也向张三讨债，张三的女儿砍柴回到家中，夏波澄见讨债不成，便将张三的女儿拉走抵债。

第三幕，在一个堆放着一些柴草乱石的破庙里。张三、李四、王二等这些被土豪逼怒的农民们，在这里商量要起来反抗地主的霸道与无耻。会上成立了农民团，大家推选张三为贫农团的团长，并决定了行动方案。

第四幕，故事的地点又回到了地主杨克明的家中。三个恶霸地主聚集在这里，正洋洋得意地饮酒作乐，他们为自己“收债”的成绩而高兴。就在此时，贫农团团长张三，带着众贫农持武器冲进来，当场活捉了杨克明、俞麻子、夏波澄三个土豪。张三问大家：“你们看，这三个土豪怎么办？”众人答：“杀！杀！”。全剧结束了。众拉三人下，边走边呼口号，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打倒土豪劣绅！革命成功万万岁！

方志敏不仅亲自主持编写了这部话剧，而且饰演了剧中的主要角色张三，令人崇敬。令人惋惜的是，1935年1月，在江西德兴县陇首村，与国民党军作战时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坚贞不

屈，8月在南昌英勇就义。

在狱中他坦然面对死亡，而对革命前途，对国家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他把中华民族经受的屈辱，把工农大众经受的压迫摧残，视为母亲的受难而义愤填膺。在这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采用一种特殊的方法，为我们留下了《可爱的中国》和《清贫》的文稿。文稿传出狱后，同志们细心地用棉花蘸了碘酒擦显出来。看方志敏的戏，读方志敏的文，那样崇高的精神境界，会让每一位读者的心都引起震荡，甚至影响他的一生。

军队的壮大，人员的增多，农民和旧军队各类人等也进入到部队中来。使军队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抬头。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对此中共中央发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作了明确的指示。1929年12月下旬，在古田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作了报告，作出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决议”第四部分对《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作了专门阐述，特别指出：“红军的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宣传队若不弄好，红军的宣传任务就荒废了一个大的部分。因此，关于宣传队的整理训练问题，是目前党要加紧努力的工作之一。”关于宣传工作的方式、方法，决议也作了详尽而具体的规定，明确强调“化装宣传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要求在部队广泛开展演剧活动，对军队戏剧的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综观苏区革命根据地的话剧活动，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各级组织和领导都非常重视戏剧活动的开展，把它作为思想教育，发动群众的重要方法。不少官居高位的领导，不仅参与戏剧创作，还积极认真的参加戏剧演出。

二、紧密结合现实的革命斗争，对鼓舞士气，振奋精神，有着独特的作用。同时，还活跃了部队的文化生活，使指战员的精神愉快，充满朝气。

三、编、导、演们的敬业精神，非常可贵，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克服许多困难，完成编演任务。

在中央文委的领导下，1929年6月5日，上海艺术剧社成立。成员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社长郑伯奇，主要负责人夏衍。剧社提出了“无产阶级戏剧运动”的口号，力图使戏剧运动由反帝反封建的一般民主主义的斗争传统，走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无产阶级戏剧运动”推动着整个话剧界向左转，在整个话剧界引起了很大的波动。

从1929年艺术剧社的筹备，到1930年8月“剧联”的成立，在上海话剧界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话剧运动向“左转”的过程。追求、探索的人找到了路子，苦闷彷徨的人积极地站起来战斗了。田汉、洪深、朱穰丞、应云卫等人的参加“剧联”，使整个话剧运动改变了一个面貌，这是中国话剧历史上波澜壮阔的一章，而贯穿着这一运动的一根红线，就是党对中国话剧事业的领导。当然，党对话剧运动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在党的领导下，上海的主要剧团、主要的话剧界人士团结在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旗帜下，还在全国一些地方设立了分盟，先后有南通分盟、北平分盟、汉口分盟、广州分盟、南京分盟等，还有杭州剧联小组、青岛剧联小组等。这些团体都发动和团结了各地的革命戏剧工作者，扩大了左翼戏剧运动的影响。可以说，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的全国主要大城市的话剧领导，完全掌握在“左翼”手里了。

左翼戏剧运动，对中国话剧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主要是它发扬了“五四”以来话剧的启蒙精神和斗争传统，自觉地使戏

剧战线成为革命总战线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提出戏剧面向工农与艺术大众化，为左翼戏剧的发展开拓了道路。在冲破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方面，显示出了左翼文艺队伍力量的壮大。同时，还造就了一批戏剧新人，初步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思想素质与艺术水平的革命戏剧队伍。后来，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先后来到延安，成为延安时期编演话剧的骨干力量。

第一节 话剧登上了延安舞台

古老的延安城，是陕北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在西北地区，它还算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城市。但在红军没有到达陕北之前，虽然话剧已引进中国三十年了，并没有普及到陕北地区。

在陕北地区首先演出话剧的是 1935 年春，由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成立的列宁剧团。当时找到了从外地流传来的三个剧本，他们抓紧时间进行了排练。三个剧本分别是：《今日之农民》。描写大革命时期江西某地佃户王老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手持镰刀，砍死上门逼债强奸自己妻子的地主“活阎王”和管家袁小狗的故事。《一·二八抗战》，写的是 1932 年 1 月 28 日夜，蔡廷锴将军领导十九路军为保卫上海，与日寇顽强奋战的情景，歌颂了十九路军将领在广大群众的鼓励下和支持下，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刁难与阻挠，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穷人的出路》，是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历史发展规律，赞颂了某地农村的贫苦农民，团结一致，拿起大刀和长矛与反动民团展开殊死搏斗的革命精神。此剧演出时，台上演得惟妙惟肖，形象逼真，台下观众悄无声息，看得认真，演出结束时，台下响起了：“打倒反动派！”“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口号声。刘志丹上台拉住杨醉乡的手说：“列宁剧团组建不久，进

步很快，你们二十多人干的事可不小呵！”。

人民抗日剧社于1936年夏，在保安县城西南的围河岸边大草坪露天剧场演出了独幕剧《侵略》。这天看戏的有中央党校的学员、红军官兵、被服厂和鞋袜厂的女工、合作社与苏区邮局的职工，拖儿带女的村民等，还有党中央机关的干部们，特别是有毛主席陪同的远渡重洋，来陕北苏区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人们都向他投以友好欢迎的目光。这位美国朋友也很动情，他与观众一起，不时地为每个节目拍手叫好。

这次看演出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西行漫记》中是这样记述的：

“不售门票，没有包厢，也无雅座。我看到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泽东以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分散在观众中间，像旁人一样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演出一开始就再也没有人去怎么注意他们了。”

“台上挂着一块红色的绸制大幕布，上面有‘人民抗日剧社’几个大字，还有拉丁化的新文字拼音，红军大力提倡拉丁化来促进群众教育。节目有三个小时，有短剧、舞蹈、歌唱、哑剧——可以说是一种杂耍表演，共同的地方是两个中心主题：抗日和革命。节目充满了明显的宣传，一点也不精致，道具都很简单。”

“最后，演出生气勃勃，幽默风趣，演员和观众打成一片，这就弥补了一部分细腻精美的不足。”

“第一个短剧叫《侵略》，以1931年满洲一村庄为背景，幕启时日军到达，把不抵抗的中国军队赶走。第二幕中，日本军官在一个农民家设宴，把中国人当作椅子坐，喝醉了酒污辱中国人的妻女。下一幕是日本毒贩在叫卖吗啡和海洛因，强迫每一农民买一份。一个青年拒绝，就被叫出来讯问；

‘你不买吗啡，你不遵守满洲国卫生条例，你不爱你的‘圣

上’溥仪，’拷打他的人这么说，‘你不好，你是抗日的匪徒!’那个青年就马上给处决了。

接着一场戏是农村集市，有些小商人在太平的气氛中叫卖货物。突然来了日本兵，搜查‘抗日匪徒’。他们要当场查看身份证，忘记带在身上的就被枪决了。接着两个日本军官大吃一个小贩的猪肉。吃完后他要他们付钱时，他们奇怪地看看他说：‘你要我们付钱？可是蒋介石把满洲、热河、察哈尔、塘沽停战、何应钦——梅津协定，冀察委员会都给了我们，也没有要一个铜板！为了一点点肉，你却要我们付钱!’他们立刻把他当作‘匪徒’用刺刀捅死了。

当然，最后村子里的人忍无可忍了。商贩们把货摊和遮阳的大伞推倒，农民们拿起长矛，妇女儿童拿起菜刀赶来，大家都宣誓要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

这个短剧很幽默风趣，用了本地方言。观众不时哄堂大笑，或者对日本人表示厌恶和仇恨的咒骂，他们情绪激动。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政治宣传，也不是滑稽戏，而是深刻的真理。演员大多数是十几岁的少年，而且是陕西和山西的本地人，但是观众由于全神贯注于剧中的思想，就把这一点完全给忘记了。

这场以滑稽戏为形式的表演所蕴藏的残酷的现实意义，并没有因为剧中的风趣和幽默而模糊起来，至少对一个在场的年轻战士如此。他在演出结束时站了起来，用感情激动的嗓子大声喊道：‘打死日本强盗！打倒杀害中国人民的凶手！打回老家去!’全场观众都齐声高喊他的口号。我后来打听到这个少年是东北人，他的父母都被日本人杀死了。”（《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107页）

斯诺还记述：“红军的剧本和歌曲都是自己写作的。有些是多才多艺的干部给他们写的，但是大多数是宣传部门的作家和艺术家写的。有些短剧是成仿吾写的，他是一个著名的文学批评

家，三年前参加红军，另外一些是中国最著名的女作家丁玲最近写的，她现在也参加了红军。”

斯诺对人民抗日剧社的演出，还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

毛主席不仅陪斯诺高兴地看了演出，还给演员们一个特殊的奖励——请斯诺和演员们吃了一顿饭。毛主席摸小演员们的头亲切地说：“你们演戏跳舞一定很饿，这顿饭要很好吃。”

《矿工》独幕话剧，是1937年2月间由中国文艺协会组织中央剧社、平凡剧社、战号剧社联合演出，是延安城第一次公演的话剧。

《矿工》又名《炭矿夫》，原是一部著名的日本剧本，描写日本矿工的悲惨生活与资本家的残酷压迫，最后因矿山发生爆炸激起了矿工们的大罢工。廖承志、朱光二人以前曾经演过这个剧，虽然手头没有剧本，但大部分情节他们都记得，于是就重新编写出来，他们将剧情改为反映我国东北三省的矿工反抗日本侵略者及资本家的斗争，剧名仍叫《矿工》。

在《矿工》一剧中，廖承志饰演老矿工、朱光饰演老矿工的兒子，其他的配角大都是北平来的青年学生担任，邓颖超、黄华（王汝梅）也参与演出，扮演角色上台表演。廖承志和朱光的表演获得一致的好评。最后，当矿山发生大爆炸，老矿工的兒子为了救同伴牺牲了。尸体被抬到舞台上，老矿工领导着矿工们开始了大罢工，全剧达到最高潮。

《阿Q正传》，话剧，1937年初夏，由西北抗日剧社总社所属的中央、平凡、战号三个剧团联合演出。廖承志饰王胡、赵品三饰阿Q，杨醉乡和董梅芳饰小尼姑。演出特别成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观看时，为演员喝彩。

《秘密》独幕话剧，是1937年上半年由中央、平凡、战号三

剧社联合演出的。该剧是朱正明从一本莫斯科出版的《国际文学》上翻译的。描写西班牙工人革命斗争的，剧情比较简单：在警察的秘密审讯室里，阴险而狡猾的警长正在审讯一个工人，要他说出工人秘密军械库地点，因为工人们已经决定在当天晚上实行总罢工。这个工人口渴难忍，警长就用一杯水来引诱他招供，警长几次将水倒进杯里又倒进壶里。甚至故意倒在工人面前的地上，但工人坚决不说。另一位工人是他的同伴，因为被迫服了毒药，神经错乱，他已忍受不住，就要说出只有他们二人知道且警长急切想得到的秘密。为了保守这个秘密，工人请求警长枪毙他的已经半疯的同伴，并假意表示愿意说出秘密。警长照办之后，工人疯狂大笑，“秘密，秘密，只有我知道，现在他死了，你已永远得不到这个秘密了，枪毙我吧！”受骗的警长恼羞成怒，拔出手枪。这时，两个警察气急败坏地冲进来报告，工人已开始武装暴动，电灯、自来水已被掐断。外面传来暴动工人的呐喊声，警长在绝望中用手枪抵住工人的胸膛，幕布在工人的笑声中落下。

廖承志扮演警长，朱光扮演工人，王玉清扮演被迫服毒工人，黄华和黄梅扮演警察。虽然排练时间不长，但演出非常成功。毛泽东、朱德、博古等中央领导也看了演出，都十分赞许。毛泽东对廖承志说：“你们好好努力，多排些好的新戏出来，让我们可以多看出几出好戏。”（《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8页）

朱光，原名朱光琛，广西博白人。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的参加者，后以上海艺术大学学生的身份作掩护，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1932年12月，在小河口会议上同余笃三、王振华、曾中生等反对张国焘推行的“左”倾错误。张国焘表面欢迎大家提意见，会后，对反对他的人都怀恨在心，而后伺机打击报复。不久，朱光被开除党籍，被押解长征，历尽艰险。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长，先后参加编导和参加演出的话剧有：《矿

工》、《卖国贼》、《秘密》、《广州暴动》、《血祭上海》等。并参加了鲁迅艺术学院的筹建工作，与沙可夫、徐一新、吕骥、左明等为筹备委员会委员。成为延安话剧的开拓者，后任马列学院秘书长，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建国后，历任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广州市市长、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副省长、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安徽省副省长。

《广州暴动》是为纪念“广州起义”十周年，由沙可夫、朱光、左明集体编导。于1937年12月11日，由中央、平凡、战号三剧社联合演出。

这是一出多场活报剧式的话剧。剧中有插曲和朗诵，剧中正面出现了党的领导人张太雷的艺术形象，反映了他领导工人赤卫队英勇起义的壮烈史实。沙可夫扮演张太雷，剧中张太雷引吭高歌，壮怀激烈。这出戏的演出很受欢迎，其中沙可夫那动人的男中音歌唱，更受到群众的赞赏。

西北战地服务团，虽然不是一个专门演话剧的组织，但在筹建过程中，话剧也占了重要成份，不仅是延安演出最早的单位之一，而且他们演出的话剧，成为延安话剧史上重要一页。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震动了全中国，也激起了陕甘宁边区广大人民的抗战热情，人们纷纷要求上前线去。7月23日，毛泽东来到抗大，在操场上作了一个报告，他号召：“只要是不怕死的，都有上前线去的机会。你们准备着好了，哪一天命令来，那一天就背起毯子走。延安需要你们，但并不需要这么多的干部。我们欢送你们出去，到前方去也好，到后方去也好，把中国弄好起来，把日本赶出去，那时再欢迎你们回来…”（丁玲《一年》1939年9月，战地出版社）当时在抗大工作的丁玲，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心情非常激动，找到早在上海相识、同在抗大工作的吴奚如商议如何上前线。因为他们二人都是文人、作

家，开头只是想组织一个记者团，提出：“只要很少的人，花很少的钱，走很多的地方，写很多的通讯。”还有想上前线的人，希望这个组织加上戏剧、歌咏和漫画等。几天后，上级指示，将原拟抗大四大队演出《母亲》和《回春之曲》的主要演员成立的宣传队和准备成立的战地记者团合并，正式组成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

8月12日，西战团召开成立大会。朱光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宣布了上级的任命：丁玲为西战团主任，吴奚如为副主任，内设通讯股、宣传股、总务股等。通讯股股长为陈克寒，主要负责撰写通讯报告，编辑发行油印刊物《战地》，主要成员有王玉清、戈矛（徐光霄）、天虚、高敏夫、黄竹君等人；宣传股股长陈明，下设戏剧、歌咏、演讲等分组。主要成员有吴坚、陈正清、李劫夫、苏醒痴、朱焰等。总务股股长李唯，负责全团的总务。其他成员有夏革非、朱慧、洛男、李君裁、王钟、吴光伟、周巍峙、邵子南、田间、史轮、高玉麟、宋琦、张可、周铭高、赵尚武、郎宗敏、刘藻如、黄明清、李唯、王在江等。成立后发布了宣言，称：“现在大规模的抗战已经开始了。我们愿赴疆场，实行战地服务；我们愿意以我们的一切贡献于抗日前线，与前线战士共甘苦，同生死，来提高前线战士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牺牲性，唤醒、动员和组织战地的民众来配合前线的作战。”组织前线民众战地后援会的团体，组织救护队、担架队、慰劳队、运输队来帮助前线作战。我们将随时报告战地的状况，使全国远处后方的民众，都时刻与前线紧紧的联络着，使全世界同情中国的人士，得慰他们的关怀。同胞们，青年们，到前线去，到前线服务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独立自由，把我们的一切贡献到前线去！（《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宣言》，1937年8月19日《新中华报》）

“西战团”是一个包括战地采访、撰写通讯报道、编辑发行油印出版物以及开展戏剧、歌咏、活动的综合性服务团体。

西战团骨干力量中，大都有演剧经验，因此，它在所有的宣传活动中，话剧演出的分量最重。出发前他们就准备了新创作的话剧《重逢》（丁玲）《王老爷》（张天虚）《东北之光》（孙强）《最后的微笑》（孙强），并排演了一些流行的救亡剧本近十个。出发前在延安进行了汇报演出，给延安的戏剧舞台添光增彩。

被毛主席誉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丁玲，不仅写剧本《重逢》、《河内一郎》，还登台演戏，丁玲参演的剧目是诗人张天虚的新剧《王老爷》。该剧描写一个八路军女宣传员对富绅王老爷进行宣传教育，让他认识到当前的局势，必须全面抗战，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丁玲扮演女宣传员。对此事丁玲是这样回忆的：“那天演出时，我仍穿我那一身灰军服，系皮带，打裹腿，也没有怎么化妆，薄薄地在脸上涂了一点油彩。门帘一掀，我走上台。台下观众都是干部，平日都是熟人，出其不意地看见是我，都哄的笑了起来。我一眼瞥去，台下张张笑脸，我一下晕了，觉得脸上发烧，心跳得厉害，好在我涂的油彩也是红色。幸好那个饰王老爷的同志赶快走过来，迎着我，客客气气地讲话，我才定下神来，慢慢地走过去，分几次，把我的台词讲完。我的戏完了，这幕剧也完了。我回到后台一看，毛主席还站在台上侧幕旁边，从缝隙里看戏呢。我一进后台，他便对我笑道：‘啊，丁玲也上台演戏了，好呀！’我听了好惭愧。”（《丁玲文集》第六卷第644页）

1937年8月15日，延安各界在大礼堂举行欢送西北战地服务团出发抗日前线晚会。毛主席出席并讲话：“战地服务团是一件大工作，因为打日本，打日本在国内在世界上都是一件大事。我们数年来要求举国团结一致抗日，今天可说已经开始实现了。这次战争可以说带着最后一次的意义。战地服务团随红军出发前方工作，你们要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口与日本打仗，军队用枪与日本打，我们要从文的方面武的方面夹攻日本帝国主义，使日